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2016年是毛澤東時代終結的四十周年和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周年。我刊歡迎海內外讀者，就毛澤東時代以及後毛澤東時代對中國未來與發展的意義，撰寫評論文章或學術論文，從歷史社會學或歷史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加以剖析。

——編者

#### 計劃生育如何被異化？

霍炫吉的〈大饑荒之後的緊急措施：計劃生育政策的重啟（1962-1966）〉（《二十一世紀》2015年12月號），是一篇內容翔實、富含洞見的好文。文中提到的許多事實及一些關鍵細節，充分展示了毛時代通過政治動員方式推行社會政策的過程和後果。儘管當時的政府文件和主流傳媒對這種以「抓」和「運動」為基本特徵的「高效」工作模式津津樂道，似乎政策目標的實現乃是「說服」、「教育」的結果，但霍文向我們揭示國家權力對個人權利乃至公民生命的傲慢與恣肆。

文中還用大量實例描述了當時各地城鄉尤其是在農村實施結扎手術和流產手術的慘痛實況。那些違背科學常識的盲

動所隱含的對人的尊嚴、健康和生命的漠視態度，絕非虛構，更非個例。文中還提到，中國知識界和醫學界在1957年「鳴放」期間曾公開強烈反對人工流產。但是在1962至1966年政府大力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期間，國內媒體上再也沒有關於人工流產正當性的爭論和對降低手術標準的批評，體現出政治權力的顛覆與強勢。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霍文通過微觀實證研究十分貼切地詮釋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名觀點，揭示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權力對人們日常生活和私密空間的全面滲透，告訴讀者人們的生育活動如何被異化為社會生產手段。

過去我們對中國當代歷史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基於當時的主流輿論宣傳。一些「黨八股」式的思維方式和流行語彙充斥於當時的主流傳媒和流傳下來的檔案文獻中。所以作為研究者，我們不但需要跳出既有的世界觀、價值觀體系，去發現那些被當時主流歷史敘事所忽略、肢解或掩蓋的維度和層面，而且需要具備從歷史檔案的意識形態話語中發現事實的能力。

董國強 上海

2015.12.8

#### 抗爭政治與稅負

趙亮的〈天災、匪亂抑或糧賦過重？——中共對1950年華東大區「搶糧」事件的探究〉（《二十一世紀》2015年12月號）着眼於共和國初期華東搶糧騷亂事件，是一篇資料翔實、脈絡清晰的文章。筆者就趙文延伸討論稅負與抗爭政治的關係，有四點商榷意見：

第一，明確稅負和政治過程的關係。戰爭、國家政權建設和稅負之間存在密切聯繫。趙文告訴我們，在戰爭結束之後的國家建設期間，稅負仍然是影響政治過程（尤其是國家—社會關係）的重要因素。

第二，採取抗爭政治的整合視角。趙文使用傳統的「騷亂」概念；問題在於，在傳統的研究理路中，騷亂、罷工、遊行、社會運動、集體暴力、革命等往往被視為不同的社會現象，並衍生出不同的術語和理論。蒂利（Charles Tilly）等人從1990年代開始以「抗爭政治」涵蓋上述概念，並發展出了一系列因果機制理論。以此為視角，我們不僅可以在統一的框架內研究抗爭現象，更可分析抗爭形式的轉化和關聯。

第三，重視抗爭行動的理性和組織性。在趙文中，我們看到的只是國家宏觀政策，沒有在政治契機面前權衡考慮的行動者，也沒有為抗爭行動提供便利的物質資源和社會網絡，更沒有抗爭者的人生歷程、文化符號和情感衝突。

第四，採取比較視角，或不同區域甚至不同國家的橫向

比較，或不同歷史時點的縱向比較。趙文也指出，如能考察中共執政初期其他地區的搶糧事件，我們的認識將大大深化。由此，比較個案分析有助於我們得出更為有力的結論。

李鈞鵬 紐約

2015.12.13

## 民國「共和」風景線

辛亥革命推翻王朝帝制踏上「共和」之路，是中國社會一次極為重要的轉型。陳建華〈「共和」主體與私密文學——再論民國初年文學與文化的非激進主義轉型〉（《二十一世紀》2015年12月號）一文，對民國「共和」的文學與文化實踐作了細緻爬梳，敞開了一面被遮蔽的風景。

民國「鴛鴦蝴蝶派」歷來為人詬病，陳建華在民國「共和」文化實踐中為其正名，還原其「純文學」性質。革命成功之後南社文人群體轉向文化建設，在專制與革命之間選擇一條非激進主義的社會改良之路，向內探索私密情感，向外拓展公共生活，致力於現代個體的主體性建設，「為『市民社會』開拓新的空間」。由此來看，以《玉梨魂》為代表的南社文人小說和他們創辦的《香豔雜誌》、《眉語》等女性主題刊物，為民國的「共和」實踐探索了一條可行的文化之路。

民國初年興起的非激進主義社會文化改良，實為融合傳統與現代於一身的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創新型發展。南社文

人發展了傳統中國的「情教」和重視家庭生活的倫理觀念，以「閨秀」為內涵塑造了一系列新女性典範。筆者曾以冰心小說為例把民國這類女性稱為「現代型賢妻良母」，她們身上體現出對傳統閨秀的一種創造性轉化，今天看來，其歷史和現實意義都是相當重要的。

畢新偉 阜陽

2015.12.17

## 徘徊在現實與理想之間

王江松在〈當代中國的勞工政治〉（《二十一世紀》2015年12月號）一文中，基於中國勞工運動的現狀，對未來提出一種展望，即將全國的「新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與「新興資產階級」開展「集體談判」，迫使後者也「抱團取暖」，向政府爭取公平合理的待遇，最終通過這種「倒逼」的方式推進中國「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

然而，「倒逼法」實現的前提是全國兩億多工人形成合力，以量取勝。可是，如今勞工的流動性很大，而且工人間極少來往，形同散沙，談何聯合？從長遠來看，愈來愈多的工人勢必被機器取代，而青壯年工人的人數也將不斷減少，這些因素都不利於跨行業、跨地區的勞工組織的建立。

其次，「倒逼法」的實現還需「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一方面與工人平等協商，一方面向政府爭取權利。且不說「資產階級」的聯合有多難，就算他們能夠「抱團」，也不得不在工人與政府的夾縫中生存。若被「逼」急了，實力強大的外企可以遷址境外；苦的是廣大中

小私營企業，生存空間本就不大，恐怕只能自生自滅了。如此剩下的最大僱主便是國企，但國企的字典裏恐怕從未有「談判」二字。說到底，未來工人的就業還是要靠私營經濟的發展，如果「逼」到最後，連私企的「皮」都被剝掉了，還談甚麼「毛」的權益呢？

王教授也知道「倒逼法」的難度之大，因此將全國範圍的工人聯合置於不可知的未來，但他堅信：「最終，中國工人必定會獲得完整的『勞工三權』……以及通過自己的政黨參與國家公共管理的權利。」這樣遠大的目標頗能鼓舞人心，但試看現實中的發達國家，就算各個行業工會勢力再龐大，也鮮有哪個政黨可以宣稱代表全體工人發聲，更何況社會制度的轉型也不是單憑哪個「階級」可以推動或主導的。

劉握宇 南京

2015.12.18

## 致謝

《二十一世紀》謹在此向2015年曾協助評審投稿的專家學者致以謝意：于濱、文貫中、王奇生、王慶節、王豐、何包鋼、吳海杰、吳國坤、呂欣怡、宋永毅、宋明煒、宋偉杰、宋錚、巫鴻、杜耀明、沈志華、周保松、周愛靈、金成鎬、侯曉佳、姜濤、徐婷婷、馬得勇、高力克、張千帆、張英進、張健、張鳴、張學明、梁中堂、郭于華、陳永發、陳宜中、陳建華、馮筱才、葉蔭聰、劉曉原、劉驥、鄭繼永、蕭知緯、應星、謝曉輝、魏時煜、羅志田、關信基、鍾磊（按筆畫序）。